

叶适《宿觉庵记》解读

蔡克骄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叶适, 南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其早年即接触佛教, 中年读佛经千卷, 对佛学造诣颇深, 晚年出资重修温州佛教名山松台山寺院, 游居其间, 并作《宿觉庵记》, 流露出他对待佛学的矛盾态度: 一方面叶适认为佛学为“世外瑰奇之说”, 与本朝治乱本不相关; 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佛学造诣颇为自许, 对学者学佛不得要领多有讥讽。

关键词: 叶适; 佛教; 《宿觉庵记》

中图分类号: G257.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1-0043-05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1.09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一、解读《宿觉庵记》

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 叶适落职回乡, 在温州城郊水心村居住。第二年, 作《宿觉庵记》^{[1]158}, 时年叶适60岁。《宿觉庵记》不到三百字, 但其中透露多种历史文化信息。如松台山的变化, 净光寺的沿革, 叶适的晚年生活, 以及叶适对佛教的态度等。为便于解读, 先将原文移录如下:

玄觉师歌诗数十章, 虽不与中国之道合, 余爱其拔钞疏之烦, 自立证解, 深而易达, 浅不可测, 明悟勇决, 不累于生死, 盖人杰也。

既歿六百年, 学者载之不衰。

所居山, 延袤十里, 有江月松风之胜, 依而寺者十数。余亦在其下, 苦疾痼, 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 钱塘本然、蜀人居宽固请登焉, 则山已入贵家, 所存二三而已。枯茶败草, 仿佛乱石中, 余慨然怜之, 为于绝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 土人但称“净光”, 故重述旧事, 题曰“宿觉”, 使宽主之。稍种竹树, 有所避隐出没, 以为风雨晦明之地。而时于坊僧巷友游居其间, 以招来其徒, 冀遇如觉者。

呜呼! 余老矣, 病而力不给, 惰而志不进, 岂非不复知以古人自期, 而遁流汨没于异方之学者哉! 盖世有畏日暮, 疾走猖狂而迷惑者, 然犹反顾不已。余之记此, 既以自警, 而又以自笑也。

嘉定二年二月。

这里的玄觉师是指唐代温州高僧玄觉, 亦称真觉、宿觉。其生平据唐魏静《禅宗永嘉集序》和北宋杨亿《无相大师行状》可知, 早年精研天台止观之学, 后于《维摩诘经》悟佛心要, 到广

收稿日期: 2008-04-14

作者简介: 蔡克骄(1954-), 男, 浙江温州人, 教授, 研究方向: 史学理论, 史学史

东禅宗六祖慧能处印证悟境，留一宿归，名重当时，著有《禅宗永嘉集》、《证道歌》等，被禅宗后学称为“宿觉大师”。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23年），玄觉大师圆寂，葬于西山之阳。约百年后（唐元和中），永嘉太守杜贲见坟有损坏，即事修补，发坟见大师遗体如生，遂上报朝廷，唐宪宗敕令造塔。造塔的筹备和建造用了数十年的时间，至唐僖宗时，塔在松台山建成，名“净光塔”。山亦随之名为净光山。接着在塔边建寺院，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塔院建成，唐昭宗赐额“净光禅寺”。后宋太宗赐额“宿觉名山”。

《记》中所称“歌诗数十章”，即应是指《证道歌》。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谁是《证道歌》的作者的论争中，800年前叶适的这一材料都没有被人提起。从《记》的第一小节看，叶适虽持有“华夷之辨”，但他对《证道歌》的内容是喜欢的、接受的、肯定的；对其作者玄觉师是钦佩的。六百年后，“学者载之不衰”，他也应是其中的学者之一。

《记》中云“所居山，延袤十里”，即松台山。今松台山南北只里许，叶适生活的时代山体大概要比现在大多了。今松台山的南麓为“人民路”，而人民路即原郡城城墙的位置。《弘治温州府志》卷三载：“松台山，又名净光山，在郡西偏，城附其上。”^{[2]34}据此，我们可知，山体应向南有所延伸。叶适说“余亦在其下”，应是指其居住在松台山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叶适遭监察御史胡宏参劾免官，回温后“卖田买宅”，在生姜门外的水心村营建住宅。叶适在《水心即事六首兼谢吴民表宣义》中有句云，“生姜门外山如染，山水娱人岁月长”、“我久无家今谩归，卖田买宅事交违”^{[1]124}。叶适在《庄夫人墓志铭》中说：“庆元戊午（公元1198年），余始居生姜门外西湖上。”^{[1]297}在《题周子实所录》中说：“余久居水心村落，农蓑圃笠，共谈垄亩间。”^{[1]603}叶适多次提到的“生姜门”，即为松台山下的“来福门”。《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城池》云：“西南曰来福门，在松台山麓，旧名集云门，俗称山脚门，讹为生姜门。”^{[2]19}“西湖”即今会昌湖。

《弘治温州府志》卷四云：“会昌湖，在郡城西南五里，唐会昌四年，韦守庸重开凿浚治，因以名。分西湖、南湖，会昌，特总名。”^{[2]160}叶适所居“水心村落”，即在西湖之中。

宋时的西湖，是温州的风景胜地。达官贵人或致仕官员，多在此建亭台楼阁、园林别墅，游憩其间。北宋温州知府杨蟠有诗句云：“为官一十政，宦游五十秋。平生忆何处，最忆是温州。思远城南曲，西岭古渡头。绿觞春送酒，红烛夜行舟，不敢言遗爱，惟应念旧游。”^{[2]685}叶适有《醉乐亭记》云：“水至城西南阔千尺，自峙岩私盐港，绿野新桥，陂荡纵横，舟艇各出菱莲中，棹歌相应和，已而皆会于思远楼下。”^{[1]150}据《弘治温州府志》卷四，其间有北宋大儒周行己的父亲正义大夫周泳的“峙岩墅”，周行己后来大概也在此住；有南宋待制陈谦的别业“水云庄”、“造物楼”，楼下有“锦云洞”，内有荷花荡，北有石山小岭；宋待制陈馥师的别墅“桂隐庄”；宋薛嵎的别业“渔村墅”等。更有“十里湖光阁”、“更远楼”、“翠红深处亭”、“安乐窝轩”、“清意味轩”、“桂轩”、“草阁”、“苜蓿轩”、“栖褊轩”、“清醒亭”、“蓑衣步亭”、“思远楼”等。湖边一带，皆垂杨夹道，宋甄监簿词云：“思远楼前路，望平堤，十里湖光，画船无数。”^{[2]161}

叶适故居，除住宅外，据《弘治温州府志》卷四载，还有草堂书楼（有曰会昌观），叶适《会昌观小集呈坐上诸友》有句云：“东池属草创，斤斧声未缩。野蔓翳前庭，中函数株菊。”^{[1]79}有莲洲（在宅东门外，小桥跨水入），叶适有诗云：“虽有莲荷浸屋东，暑烦睡过一陂红。秋来人意稍苏醒，似惜霜前零乱风。”^{[1]124}有菊圃（在草堂南），叶适有诗云：“拒霜旋插花疏疏，甘菊新移日晒枯。花草只今如此在，几时写作会昌图。”^{[1]124}后来叶适子叶冢还建有西岩道院。

家居水心第二年，叶适曾患重病，“庆元己未（公元1199年）夏，余畏风，更用寒热，药不

疗病，聚腹肋上行，四肢百体皆失度，如土木偶。众医妄议却立，亲党不知所为，多引去”^{[1]293}。

“庆元己未，始得异疾，六年不自分生死。笔墨之道废，嘉泰甲子（公元1204年），若稍苏而未愈也。”^{[1]843}可知叶适晚年受病痛折磨，在1209年作此《记》时，仍“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待钱塘本然、蜀人居宽固请登山，此时叶适见到的松台山，已非往日景象。山已入贵家，所存二三而已。枯茶败草，仿佛乱石中。叶适深有感慨，便于绝景亭下作一小精舍。

绝景亭，亦作绝境亭，为松台山名胜。北宋周行己有《绝境亭》诗云：“云横绝尘境，峻堞若绳削。群山列培塿，众水分脉络。下瞰万瓦居，缥缈见楼阁。松风发天籁，冷然众音作。皎皎天宇清，尘襟一澄廓。”^[3]后永嘉四灵中的徐照、徐玑都有绝境亭诗与叶适唱和，从徐照《净光山四咏呈水心先生》之《绝境亭》中的“公能同众乐，私帑建官亭”诗句来看^{[4]54}，叶适在建精舍时，曾用自己的钱对绝境亭进行修缮。

何为精舍？有人曾撰文认为是叶适的书斋。精舍可作书斋解，但更通常是对道士、僧人修炼居住之所的称呼。从该《记》上下文联系起来看，似作寺庙解更为合适。叶适看到唐代古寺“净光禅寺”毁坏在“枯茶败草，仿佛乱石中”，慨然怜之，出资在绝景亭下重建，重述旧事，题其名曰“宿觉庵”，并请蜀人居宽主持寺务。又稍种竹树，使寺庙掩映其间，以为隐蔽出没，时与坊僧巷友游居其间。并用以招徕高僧，希望能遇到如玄觉般高水平的大师。

宿觉庵建成后，除写此《宿觉庵记》外，叶适还写有《宿觉庵》诗一首。诗云：“宿觉名未谢，残山今尚存。暂开云外宅，不闭雨中门。麦熟僧常饿，茶枯客漫吞。荒凉自有趣，衰病遗谁言？”^{[1]96}叶适说的“坊僧巷友”应包含徐照、徐玑等。他们过往甚密，徐照在读该《记》与该《诗》后，在《净光山四咏呈水心先生》之《宿觉庵》中云：“公说曹溪事，经今六百年。庵基平地筑，碑记远人传。种竹初遮日，疏岩只欠泉。自当居鼎鼐，岂在学修禅。”^{[4]54}徐玑《宿觉庵》诗云：“欲问庵中事，无论先与后。还因一宿觉，不用再参禅。门远青山曲，檐依古木边。谁当秋夜静，来看月孤圆。”^{[4]131}应该说他们对叶适此时的心态是理解的。至于徐照、徐玑的诗风，论者认为禅化是一大特点。他们选择山居，与僧人来往，诗中充满禅境、禅趣，表现了诗人对僧人生活的认同。

此《记》最后一小节表明，进入晚年的叶适“病而力不给，惰而志不进”，已不自觉地“不复知以古人自期，而遁流汨没于异方之学”。所谓“异方之学”，就是指佛教学说。

二、叶适的佛学态度

其实，叶适对佛教的接触由来已久。早年曾在居士刘愈处受学，叶适说：“有隐者刘君，名愈，字进之，学佛得空解，自称无相。……余少学于君。”^{[1]332}叶适后来喜读佛经，可能就受他的影响。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叶适在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任上，闲暇时读佛经数千卷，曾写信给朱熹和陈傅良讨论体会。宋刘埙《隐居通议》卷一《水心论佛学》说：“先生以荆州读佛书有见，告之文公（朱熹），文公答曰：此殊可骇，不谓正则（叶适）乃作如此语话。”^[5]在《朱子大全》卷五六《答叶正则书》中我们可知叶适是这样说的：“在荆州无事，看佛书，乃知世外瑰奇之说，本不能与治道相乱，所以参杂辩争，亦是读者不深考尔。”^[6]在叶适看来，佛学为“世外瑰奇之说”，与本朝治乱本不相关，故无需像程、朱那样“参杂辩争”。这一观点让朱熹感到惊骇，但陈傅良却对此表示理解。他听说叶适在读佛经，作《闻叶正则阅藏经次其送客韵以问之》：“西方亦人豪，国自有乾坤。书来入中州，坐使学者奔。君岂舍从之，或但游其藩？吾闻欲乘槎，凿

空访河根!孰与斗瞻车,把舵行江湍。”^[7]只是其中“君岂舍从之,或但游其藩”这一问或对叶适来说是一棒喝,调整了他以后对佛教的态度。

叶适对自己的佛学造诣还是颇为自许的。他在《题张君所注佛书》中说:“黄岩张士特,示余注《心经》、《金刚》、《圆觉》、《楞严》、《四十二章》及《标题节注》、《经律纠异》等皆备。余昔在荆州,无吏责,读浮屠书尽千卷。于其义类,粗若该涉。今观张君贯穿出入,证会反复,悉从旧文,不以私意为之说也,至于要言微趣,人所难知,往往迎刃冰解,则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质略浅俗,是时天竺未测汉事,采摘大意,颇用华言以复命,非浮屠氏本书也。夫西戎僻阻,无有礼义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生喜怒哀乐之间,披析解剥,别其真妄,究其终始,为圣狂贤不肖之分,盖世外奇伟广博之论也,与中国之学皎然殊异,岂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浅深,猥欲强为攘斥,然反以中国之学佐佑异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于道鲜矣。”^{[1]599}从这里我们可以考察出叶适读佛经之多、之广。

同时,叶适对学者学佛不得要领多有讥讽,如《宗记序》^{[1]223}中记与鲍埜的问答:

余尝问埜:“儒之于佛,强者愠,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为之分高而别下,取要而舍烦哉?”埜曰:“无道也,悟而已矣。”其为是宗者,亦曰:“无道也,悟而已矣。”余闻而愈悲。……虽然,考之于其书,则信悟矣。

又如《题张君所注佛书》^{[1]599}中记与范东叔的问答:

余间请东叔:“《楞严》要义安在?”东叔沉思久之,曰:“如鸡后鸣,顾瞻东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扑到紧要处也。”余闻而叹息。夫不读者固不能知,而读者之知止于如此。呜呼!安得以张君所注之语乎!

再如《法明寺教藏序》^{[1]222}中记与昶的问答:

夫浮屠以身为旅泊而严其宫室不已,以言为赘疣而传于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尝以问昶,昶亦不能言也。

这些记载都有哀其不争的意思。而对学问高深的大师、学者,叶适是深为佩服的,除已引《宿觉庵记》对玄觉的评价、《题张君所注佛书》中对张君的评价外,再看《题端信师帖》对端信大师的评价:“端信大师自天台教观兼习诸宗,性义融彻,词辨锋起。淳熙初,都下禅讲尚多宿旧名人,师年少,操矛入室,援据今古,中其机要,咸相顾叹骇曰‘信书橱,不可与争也!……阖户长年,人莫识面,惟教其徒,令速趋西方空寂,无世间名利语。以此自终。余每病学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实堕俗纷,若师,庶几免矣。”^{[1]601}

当然,纵观叶适一生他往往以儒者自居,在学术上坚决主张“华夷之辩”,而在年老志衰之时,他不知不觉又“遁流汨没于异方之学”,自己也觉得可笑,此《记》说是用以“自警”,实际上也是用以“自嘲”。

参考文献

- [1] 叶适. 叶适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2] 王瓚. 弘治府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 [3] 周梦江. 周行己集[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166.
- [4] 徐照, 徐玑, 翁卷, 等. 永嘉四灵诗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 [5] 永瑛, 纪昀. 四库全书: 第866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1.

[6] 中华书局. 四部备要: 第 19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7.

[7] 陈傅良. 陈傅良先生文集[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 32.

On Ye Shi's *Su Jue An Ji*

CAI Kejiao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Ye Shi was a renowned scholar of Yongjia Schoo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was familiar with Buddhism in his early years, finished reading thousand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his middle age, and ha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bout Buddhism. He helped to rebuild the Buddhist temple at the foot of Songtai hill in Wenzhou in his old age. While he was stayed there he wrote *Su Jue An Ji*, which demonstrated his contradictory attitude towards Buddhism. On the one hand, he thought Buddhism belonged to exotic thing whi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ynasty's polic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very proud of his knowledge about Buddhism and looked down upon those scholars who could not grasped the spirit of Buddhism during their studies.

Key words: Ye Shi; Buddhism; *Su Jue An Ji*

(编辑: 杨峰)